

新进步主义能拯救美国吗？

——简评帕特南教授等新著《上升趋势》

李海默*

[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等人2020年所著《上升趋势：一个世纪前美国人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再次做到这一点》一书，分析了该书的各项优劣之点，并将该书与别的若干新出相关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比较衡量。总体而言，该书为我们理解今日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提供了新的思维和观察点，也充分揭示出美国当代政治极化必须要通过全盘改进、输入新理念的方式方有可能得到有效缓解，局部的小修小补是很难真正起作用的。

[关键词] 帕特南 美国政治 政治极化现象

在笔者2021年2月刊于上海澎湃新闻新闻思想市场的《萧条谢幕之后，特朗普风潮会卷土重来吗》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美国政治和历史学界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2015年以来的美国政治运行模式非常像镀金时代（Gilded Age）曾发生过的那段往事。镀金时代，处于美国历史中的南北战争时期和进步时代之间，时间上大概是从1870年到1900年。普遍认为这个时代的代表特征就是南北战争之后的充满贪婪和政治腐败的美国政府。”^①关于这种比拟，笔者近日读到一部作品，提供了别样的思路取向，谨此与大家略做分享。

* 李海默，美国休斯敦大学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① 关于此点，亦可参阅李海默《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另一种观察》，刊于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LiHaiMo/2018_04_06_452786.shtml。2018-04-06。

这部书就是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Robert D. Putnam）等人所著《上升趋势：一个世纪前美国人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再次做到这一点》。^① 帕特南教授曾著有《使民主运转起来》《独自打保龄》《我们的孩子》等名作，而这本书则是他最新的一部作品。

帕特南等分析相关数据后指出从镀金时代（Gilded Age）到当代美国，125年间大致呈现一个山型曲线，作为山脚的镀金时代和当代美国都是强调个体当先（I），^② 而作为山顶的20世纪中期美国则是强调“我们”（We）的价值。帕特南等指出，山顶时期的20世纪中叶之美国贫富阶层之间的差距相对来讲为最小，对于贫者阶层的社会扶助项目投入则最大，政治极化现象相对而言为最轻，民众之间彼此最为团结。^③ 帕特南等认为，自20世纪中叶到现如今的美国，这些关键指数一直在走下坡路。帕特南等使用经济不平等性、政治党派极化互斗、社会资本走向、文化上的自恋性四大框架进行分析，均发现20世纪中叶可以说是美国的黄金时代，而处于两头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1世纪前期，^④ 则是明显的衰落期低谷，充斥着激烈的党派恶斗、非常深远的经济与社会性不平等及各种各样的失范现象。在帕特南等看来，美国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大致是1890—1920年间）所倡导的所谓社群主义导向（communitarian）可能是将美国带离镀金时代之沉沦而振翅跃起的关键力量。广义而言，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的胡适的老师杜威（John Dewey）教授也属于此一社群主义导向潮流之一翼。所谓进步主义^⑤的核心号召，即遏制金权政治（plutocracy），反对以交换商品或服务的方式来得到政治支持，希望能通过持续不断的进步而达到更广泛的平等、不同党派间的合作、人民大众间的联结与互助互利。同时，进步主义运动亦有趋向民间草根阶层

① The Upswing, *How America Came Together a Century Ago and How We Can Do It Again*, Simon & Schuster, 2020.

② 在帕特南看来，美国人应对新冠疫情时展示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以自我为中心，不顾集体利益、大局利益的思想，也是美国当代病灶的一环，参见 <https://time.com/5917385/history-community-america/>.

③ The Upswing, *How America Came Together a Century Ago and How We Can Do It Again*, Simon & Schuster, 2020, Chapter 1.

④ 美国学者 Nathan J. Kelly 的研究也指出，当前美国贫富阶层之间的差距应是自20世纪初以来百余年间最大的，略可一比的正是百余年前的20世纪初，参见 Nathan J. Kelly, *America's Inequality Tra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⑤ 美国政治学者格林教授曾说过，进步主义核心理念之一是求索所谓社会公平正义，参见 Jeffrey Edward Gree, *The Shadow of Unfairness: A Plebeian Theory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的性质，许多改革措施的最初发动来源不在精英云集的华盛顿或常春藤名校，而是兴起于一些普通平凡的美国小镇上。^① 帕特南等亦指出，镀金时代里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都衍生出了高度的复杂性，使得普通的民众感到茫然无所适从，从而产生灰心丧气、不满无奈之感。而进步主义范式新风的到来，主旨正是在于提高个体的智能及对自身生活的掌控能力，以期重振普通民众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镀金时代情况的改善是这样开始的：在镀金时代末期，一大堆亟待改革的新议题浮上水面，充斥着美国政治场域，包括长者、无业和残疾人士的保险问题，累进税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劳动法问题，反垄断问题，女性投票权问题，选战相关事务的财务改革问题等，而传统大党在这一系列改革问题上的表现都远不尽如人意，导致不少持第三党立场的候选人纷纷出现并受到社会关注。最初的时候，支持改革的主要力量是来自民主党的进步主义势力一系，但到20世纪初叶，共和党中的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开始全力支持进步主义议程，导致共和党也分化为建制派一翼和进步主义势力一翼。这种跨党派性质的对进步主义议程的提倡和支持，最初开始于19世纪80—90年代，但那时还仅只限于各州和地方的层面，要到20世纪初年才随着西奥多·罗斯福的崛起而蔓延至全美和联邦层面。通过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人物，进步主义议程弥漫于两大主要政党，并最终改变了两党的面貌，到1912年时三大主要总统候选人（当时西奥多·罗斯福以第三党身份参选）皆宣称其路线是进步主义范式的，尽管实际上他们所持政见各有不同，但他们确实都支持反垄断立法，并支持联邦层级的累进所得税。尽管西奥多·罗斯福在1912大选并未胜出，但帕特南认为他的政治主张深刻影响了当选的威尔逊政权，并于后来影响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以至于更久远的美国政治史进程（进步主义时代开始后主要改革性质法案的通过往往皆获有两大党同力支持）。^②

同时，在帕特南等看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包括校园暴力、民权运动、都市暴动、反对越战示威、刺杀政治人物等，最终促发了下滑轨迹的开启。60年代释放出的是自私精神、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赏以及整个社会

^① See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a-new-progressive-era-a-conversation-with-robert-putnam-and-shaylyn-romney-garrett/>.

^② Robert D. Putnam, *The Upswing: How America Came Together a Century Ago and How We Can Do It Again*, Simon and Schuster, 2020, pp. 7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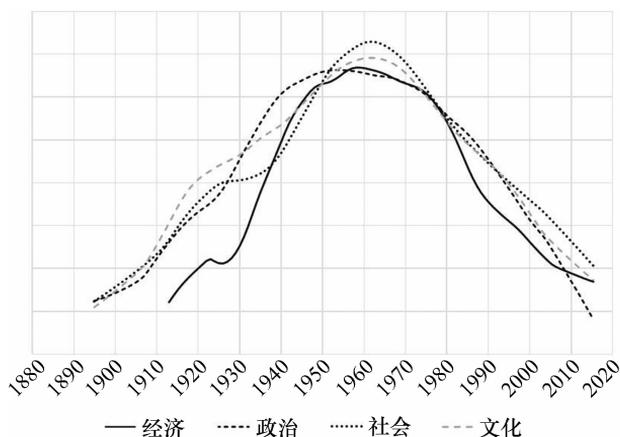


图1 书中所给出的美国1895—2015年间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情况走势图

的趋于原子化个体现象，人人都变得自以为依靠，为了追求自我利益实现而不择手段。20世纪40—50年代那个以层累渐进式的进步主义和社群主义为显著标识的美国黄金时代，也逐渐随之崩蚀，最终完全褪色消散。帕特南也指出，在20世纪40—50年代，大多数的两党支持者在大多数时候都倾向于信任政府，不管执政的是哪一个党派。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从整体上开始下滑，特别是当执政党与受访的个体民众所倾向支持的党派不一致时，这种不信任感表现得尤其显著。1964年，美国普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77个百分点，但后来的十多年里经过越战、水门事件、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系列种族与经济议题风波的洗礼之后，这一数据到1978年时急剧跌落只剩29个百分点。此后，虽在里根与克林顿总统任内有小幅反弹，但却一直都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和起色，进入21世纪后更是长期低迷。随之派生出的就是广泛存在的犬儒主义范式的愤世嫉俗（public cynicism）与政治上强烈的异化和疏离感。^①实际上，将60年代定为衰落趋势分水岭的其实远不止帕特南。美国学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A. Murray）于其2012年的著作^②中就已表达了相当类似的想法，他认为，即使仅仅只关注美国白人社会，从1960年到2010年之间的逐步衰败也是显而易见的，

^① Robert D. Putnam, *The Upswing: How America Came Together a Century Ago and How We Can Do It Again*, Simon and Schuster, 2020, p. 103.

^②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 - 2010*, New York: Crown Forum, 2013, Chapter 1.

在勤勉、诚实、信仰宗教、忠实于婚姻这几个关键层面，白人社会都一直处于不断下滑的状态。

一 与若干其他新出研究间的比较分析

拿这本书和二十年前的帕特南名著《独自打保龄》相比较，是很有趣味的。比如，在《独自打保龄》中，帕特南感叹的其中关键一点就是美国公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下降。数据表明，近几年来美国公众对投票的热情比几十多年前的 20 世纪 90 年代增长了至少 10 个百分点以上，但是新的政治剧烈极化现象却随之而来。也就是说，政治参与热情看似增长，政治极化现象却接踵翩然而至。此书也指出，极化现象与此书所表彰的 20 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新风可谓背道而驰，因为后者强调的是真正的创新，亦即超越于意识形态藩篱网罗之上的创新，而前者则正好会排斥那些试图开创新局（而不拘泥于刻板的左右分野）之举。^① 美国学者克里斯汀·劳林（Kristin Laurin）等人最近的研究就指出，在一定范围内，政治极化也许能带来正向效应，但如今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已明显失控，不同政见立场的各方无法实现调和共进，导致通过政治程序已无法及时有效处理社会问题。而他们预测未来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走向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极化现象仍将不断被强化，尚未见其上升轨迹的尽头；二是极化现象可能已于近期到达高点，今后或许会有所回落。^② 两种可能性俱存在，足可见美国内部面临的问题和压力都是极大的。^③ 不过，帕特南等也明确谈到了所谓钟摆效应用之于物理现象和解释人类社会的

① Robert D. Putnam, *The Upswing: How America Came Together a Century Ago and How We Can Do It Again*, Simon and Schuster, 2020, pp. 329 – 330; 亦可参阅 James MacGregor Burns, *The Deadlock of Democracy: Four-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 with a New Prologue*, Prentice-Hall, 1967, pp. 82 – 83.

② Heltzel, Gordon, Kristin Laurin, “Polarization in America: Two Possible Futures”,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34, 2020, pp. 179 – 184.

③ 比如说，在 2021 年 8 月初笔者完成此稿时，FiveThirtyEight 预测的拜登的民众普遍支持率是 51.5%，面临的反对率是 43.4%，这样的数字足以说明美国当前社会尖锐的极化现象（因为仅从理论上说，拜登的抗疫措施比特朗普强得多，但事实则是明显大批美国人对拜登的治理并不买账）。所谓极化的核心特征正是正反两方力量相当，互不相让，针尖对麦芒，持久拉锯。Gallup 在这方面测得的民调显示得更为明显，参见 <https://news.gallup.com/poll/352733/biden-approval-drops-lowest-date.aspx>；亦可参见李海默《为什么拜登百日执政民调表现不佳？》，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37456。2021 – 04 – 29。

不同之处。物理现象中钟摆效应的复归是理想化和几乎注定发生的，其轨迹是非常完美的，但在人类社会，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状态，所有的轨迹描摹都是时断时续的，有时会发生剧烈变化，有时会发生长期停滞，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的运行轨迹最终是取决于人类展现的智能和领导力，因此，趋势性的变化并非必然会发生，而全视乎具体时段里的人类能力（尤其是当政者的领导力）表现状况。^①

帕特南等对于进步主义的描述颇为一厢情愿，充满溢美之词。他们将进步主义定义为一种道德上的重新醒觉（a moral awakening），据说通过那种基于社群主义理念的进步主义，不同的意见分歧可以逐渐得到弥合，人们也会变得更少考虑自身得失，转而更多关心彼此之间所应做到的相互照应与扶助。在帕特南等看来，在20世纪初叶，美国进步主义接续于民粹主义的兴盛之后而发生，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而只有强调缓进与稳步改革（slow and steady reforms）的进步主义才得以与所谓“美国价值”实现接轨。当时的进步主义者们懂得政治上妥协的重要性，他们既强调社群主义理念，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和较为衡平的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保护私有财产与个体自由，只在既有体系内寻求变革。即使帕特南等的这种归纳并不全错，^②但无疑也是过度地渲染了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实际扮演的角色和发生的效力。当然，帕特南等确有充分注意到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乃是一场由白人中产阶级所主导的运动，不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充斥着种族隔离与白人至上的偏见，因此，帕特南等强调21世纪的新进步主义运动应注重平等与包容（equality and inclusion），并争取要在这些原则上不打折扣。看起来帕特南等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论述与铺陈似乎主要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立论中所暗含的保守主义取向和理路，因此希望能在大的结论上做一些限制和区隔，使他们不要被读者视若仅仅是为保守主义理念张目而已。另外，在帕特南等的笔下，其实保守主义也的确并不扮演特别光彩的角色，按帕特南等的描述，艾茵·兰德（Ayn Rand）、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

^① Robert D. Putnam, *The Upswing: How America Came Together a Century Ago and How We Can Do It Again*, Simon and Schuster, 2020, pp. 289–290.

^② 学术界认为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有两大特征：第一，强调优质而高效的政府公共治理；第二，强调弥平阶级之间激烈的对立冲突，相比于提高穷人生活水平，更为关注的是抑制富人阶层的骄横和放纵，参见 Paula Baker, “Politics in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Edited by Paula Baker and Donald T. Critchlow), Online Publication, Date: Apr. 2020.

man) 等人所宣扬的带强烈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 使得美国保守主义思潮日渐将自身与“个人主义”取向相挂钩。^① 实际上, 与其说此书是为保守主义辩护, 不如说此书是希望促使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去接受若干的保守道德理念, 为己所运用, 比如该书就花费了不小的篇幅谈当代左派世俗进步主义分子 (secular small-p progressives) 不应随意斥绝来自宗教和道德领域的话语论说, 而是应建立某种“统一战线”, 使那些宗教论说能为己所用。

帕特南等盛赞进步主义时代, 将进步主义时代的最大特性说成是相信“普通人团结起来能改变历史发展进程”, 然而, 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一大核心特征就是规管型国家 (regulatory state) 和专家式政治的建立,^② 而这些特质在今日美国其实并不一定真的有效。按照最近美国政治学者斯蒂芬·斯科罗内克 (Stephen Skowronek) 和约翰·迪尔伯恩 (John A. Dearborn) 等人合著的新书《被围困共和国中的两个幽灵: 深层政府与一元型总统制理论》(*Phantoms of a Beleaguered Republic: The Deep State and The Unitary Executive*)^③ 所指出的那样, 今日美国人实际面临着双重挑战: 一是根深蒂固的所谓官僚体系“深层政府”, 意欲阻挡民意的实现, 并减低民选政治领袖的权威; 二是试图压制住理性与法制声音的一元型总统制理论 (尤其以特朗普为代表)。这两重挑战就是使美国政治陷入重围的两个幽灵, 这两者互相对战叫骂, 同时又互相勾连, 在斯科罗内克等人看来, 其实就是同一病灶在两个不同层面的不同展现, 本质上乃是一体。斯科罗内克等人警告, 如这两个“幽灵”现象不被妥善处理, 其紧张对立关系甚至可能撕裂整个美国政治, 造成严重后果。斯科罗内克等人丝毫无意为所谓“深层政府”进行开脱, 在他们看来, 当代美国日常政治中的官僚规管型体制确实是客观存在, 而且也确实植根很“深”。^④ 因此, 当代美国真的需要更多的规管与专家政治吗? 这本身就是

① Robert D. Putnam, *The Upswing: How America Came Together a Century Ago and How We Can Do It Again*, Simon and Schuster, 2020, pp. 186 – 188.

② 参见 Thomas C. Leonard, “Progressive Era Origins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and the Economist as Exper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2015; Vol. 47, issue suppl_1, pp. 49 – 76; 亦可参阅 Edward L. Glaeser and Andrei Shleifer, Edward, L., Andrei Shleifer,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1, No. 2, 2003, pp. 401 – 425.

③ Stephen Skowronek, John A. Dearborn, and Desmond King *Phantoms of a Beleaguered Republic: The Deep state and the Unitary Execu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④ 李海默:《“深层政府”与一元型总统制: 美国当代政治中的两个幽灵?》,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_Detail_forward_12601578, 2021 – 05 – 24。

一个问题。另外，帕特南等盛赞进步主义时代的上扬效应，却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政治场上扮演主导角色的乃是共和党，而非民主党。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杰克·巴尔金（Jack M. Balkin）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本来到了1896年时，自美国内战以来长期主导美国国内政治的共和党看起来似乎气数将尽，应轮到民主党振起。然而，民主党却白白坐失了机会，由共和党的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主导，改变其政纲路线，致力于吸引城市工人和其他专业技术领域人士的支持，扩大了共和党的民意基础，使得共和党继续统领主导美国国内政治30余年（其间虽1913—1921年总统职位由民主党人威尔逊担任，但并未改变共和党主导局面），直到罗斯福新政开始方才告终。^① 仅这一条，便与今日美国共和党的情况大相径庭，可见历史就算可能相似，却绝不可能完全雷同。同样的道理，在帕特南等所艳羡的20世纪中期的美国，非拉丁裔白人占人口总量87.5%，黑人占10%。^② 而目前的美国最新人口统计数据则显示，非拉丁裔白人占人口总量60.1%，黑人占13.4%，亚裔占5.9%，拉丁裔占18.5%。^③ 这两个数据对比，无疑显示美国经历了十分重大的人口结构变革，故而社会整体面貌也必定有极大之不同。如果确如帕特南等人所指出的，美国走出镀金时代泥淖凭借的是超党派的进步主义范式共识，那今日美国连是否存在这样一个超党派共识都成疑问，遑论其余。即便真的存在共识，会不会就是所谓民粹主义思潮呢？即便不是民粹主义，就一定会是某种新的进步主义范式共识吗？借助社交媒体的神奇力量充斥泛滥于今日美国社会的假信息、阴谋论和犬儒主义思潮，^④ 是否又会造成本质性的异化？凡此种种，皆是未解之问题。正如美国政治学者詹姆斯·莫罗内（James A. Morone）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今日美国政治场上的喧嚣争吵本身并不算得上是新现象，真正的新现象是泾渭分明的两党彼此战线。尤其是，在这战线上截然对立着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我们是谁？美国为何？”的身

① 参见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2020/11/03/reagan-trump-political-regimes-biden-cycles/>。从论述上我们可以看到，帕特南特别强调西奥多·罗斯福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但耶鲁的Balkin教授则特别强调麦金莱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②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ical_racial_and_ethnic_demographics_of_the_United_States。

③ 参见 <https://www.census.gov/quickfacts/fact/table/US/PST045219>。

④ David C. Barker, et al. (ed.), *The Politics of Truth in Polarized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份认同界定。^①

我们亦可将此书论点与美国政治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新著《长期博弈》（*The Long Game*）相比较，杜如松认为，“上世纪美国发生过4次衰退主义浪潮，第一次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但经过罗斯福的新政计划重塑了美国。到战后美国又回到了最佳状态。”^②第二次出现在1957年，当时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但之后美国建立了联邦支持的科研和教育机构，使其在后来数十年里成为太空科技领导者。而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第三次衰退主义浪潮最为漫长，美国经历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暗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和停滞性通胀的到来，尼克松被弹劾和南越政权的倒台。但是，最终这些事件带来了调整和更新。社会动荡推动了民权改革，弹劾行动重申了法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带来了美元的统治地位，越战的失败结束了征兵，苏联入侵阿富汗加速了其崩溃。第四次衰退主义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工业侵蚀、贸易逆差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为特征，促使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宗加斯（Tsongas）在竞选总统时提出“冷战结束，日本赢了”的口号。但是，美国还是成功地利用信息技术革命，使其被誉为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现在，美国处于第五次衰退主义浪潮中。但杜如松仍对美国相当有信心，他宣称：“美国的软实力来自其开放的社会和公民的信仰。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事件发生后的抗议活动，实际反映了公众为实现美国创始价值观而进行的斗争，这种价值观吸引了全球观众。”^③杜如松引述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话说，每一次美国的衰退都展示了这个国家“一个不寻常的自我纠正能力”。很明显，杜如松的书比起帕特南等的来，要更为意识形态先行（也可以说充斥着更多的陈腐“美国例外论”腔调），因此也明显更不可信，但是即使是杜如松这种带有“吹捧”性质的研究，也至少在三个点上与帕特南相呼应：一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衰退主义浪潮扮演的角色位置可称至关重要；二是现如今的美国确实实实在处在一种衰退的潮

^① James A. Morone, *Republic of Wrath: How American Politics Turned Tribal,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Donald Trump*, Basic Books, 2020; Matthew Levendusky, *Our Common Bonds: Using What Americans Share to Help Bridge the Partisan Divid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②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③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Chapter 1.

流之中，有待振起和自救；^① 三是他们都认为罗斯福新政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情况有明显的救援效果。

而帕特南等人在此书里所做的研究，从总体层面无疑比杜如松的要更为可信一些。

二 此书存在的一些盲点

让我们再回到学术范式的讨论上。从严格的社会科学角度来讲，帕特南等承认他们对于整个现象的因果关系逻辑并没能完全搞清楚，哪些是因，哪些是果，并不完全清晰。^② 帕特南等所致力反映的主要是一种较为宏大的历史叙事场景。

帕特南等讲的较多的是政治理念和社会思潮上应发生的变化，但即使这些变化真如帕特南所期待的那样发生，是否就能有效改进当前美国政治严峻的极化对立现象，改变美国日益显著的“金权统治”格局，^③ 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之数。美国学者约翰·赛德斯（John Sides）等人针对 2020 年总统大选的研究指出，2020 年总统大选与其说是促使美国各界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其国家面临的挑战——包括新冠疫情大流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案和国会山骚乱等——实际上，这一系列挑战反而是更进一步加剧了分歧。^④ 另外，所谓进步主义，在当代美国政治光谱中无非只是民主党内“中间偏左”派系（Center-left factions）中之一翼，其是否真能主导整个民主党尚存极大疑问，更遑论在政治极化现象十分尖锐的当代美国是否能为广大社会公众所广泛接受。帕特南等人抨击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走向衰颓，但当代美国政治语境中现有的这种“进步主义”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那些运动关系牵连甚深（当然，其自身一般不愿意承认或强调这种牵连^⑤）。

很有趣的一点是，帕特南等人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走势的解读，与美国广大公众的一般性看法是有很大不同的。按照盖洛普民调（Gallup）提供的数

① 这些实际情况，是连杜如松这样密切参与美国实际政治运作的人都无法否认的。

② 参见 <https://www.harvardmagazine.com/2020/11/montage-yearning-for-upswing>。

③ 李海默：《特朗普的推特及其 8730 万粉丝》，《第一财经日报》2020 年 12 月 11 日。

④ John Sides, et al., *The Bitter End: The 2020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⑤ John Ingram Gilderbloom, et al., *Community versus Commodity*, SUNY Press, 1992, pp. 103 - 104.

据，1962—2001 年美国公众对美国全球形象与全球地位的满意度几乎一直在爬升，从 44% 最高升到 71%，但 2001 年之后出现剧烈的震荡，且进入总体层面的下跌轨道，到 2021 年时最低跌到只有 37%（2008 年金融危机时更跌倒只剩 30%^①）。按笔者的理解，很可能帕特南等的长线观察要比美国普通民众的一般感知来得更靠谱，实际上，美国民众从 20 世纪 60 年代直到 20 世纪与 21 世纪交汇处的四十年自我感觉良好，^② 也许仅仅只是一种对大趋势、大变化茫然无所体察的幻觉。



图 2 1962—2021 年美国公众对美国全球形象与全球地位的满意度 (%)

另外，若我们侧重于关注美国自 1961 年以来的 GDP 年增长率，则确实亦能看到整体上该长线数据呈现逐渐下滑的趋势走向。^③ 似乎也远远应和着帕特南等的结论。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最有钱的 1% 人口只占有其社会 25% 的财富，但是在当代美国最有钱的 1% 人口已占有全社会 40% 的财富；在 20 世纪 40 年代，全社会范围而言下一代的子女们收入多于上一代父母收入的比例大约是 90%，到今日这一比例已下降到只有 50% 左右。^④ 此外，帕特南的研究也与美国学者詹姆斯·坎贝尔（James E. Campbell）对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分析相呼应，坎贝尔认为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并不在于党派极化或媒

① 参见 <https://news.gallup.com/poll/116350/position-world.aspx>.

② 其中，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自然扮演重要角色。

③ 参见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US>.

④ 参见 Olivier Blanchard, Dani Rodrik, *Combating Inequality: Rethinking Government's Role*, MIT Press, 2021.

体渲染，而实际上起源于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广大公众中以自下而上（bottom up）模式生成的彼此对立极化。^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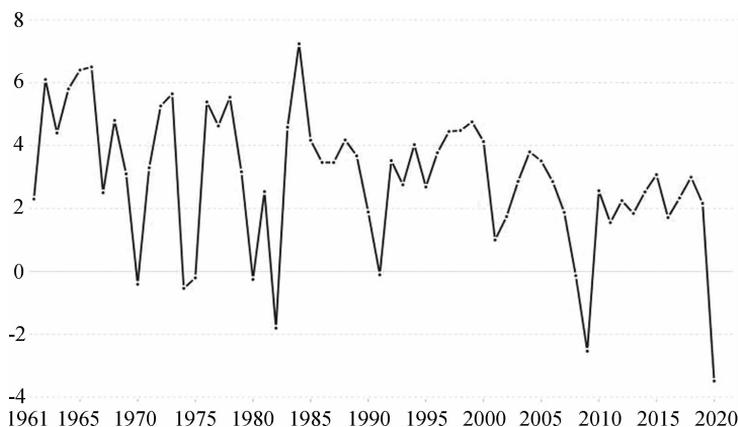


图3 美国 1961—2020 年的 GDP 年增长率 (%)^②

具体到政治制度设计的层面，帕特南等亦很诚实地承认美国固有制度有若干潜在问题，比如麦迪逊主义式（Madisonian）的权力分立和制衡体系，联邦机制，参议院冗长发言阻挠议事（senatorial filibuster）机制，政策制定程序中的多个“合法反对节点”，两党复杂博弈程序等，皆使得美国政治人物在表决公共政策时更容易说“不”。^③ 但是，帕特南等并未就制度层面提出大刀阔斧的改革建议。相形之下，美国知名政治学者特里·莫（Terry Moe）等人就直白得多，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当前绩效不彰的本质原因乃是由于整个治理体系过度老旧，缺乏实效和领导力，因此他们抛出了一系列直接针对制度面做改革再造的建议。^④ 而另一位美国政治学者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则认为如不能直接动手改变制度设计，至

① James E. Campbell, *Polarized: Making Sense of a Divided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② 根据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经合组织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绘制。

③ Robert D. Putnam, *The Upswing: How America Came Together a Century Ago and How We Can Do It Again*, Simon and Schuster, 2020, pp. 102 - 103.

④ See William G Howell, Terry M. Moe, *Relic: How Our Constitution Undermines Effective Government—and Why We Need a More Powerful Presidency*, Basic Books, 2016; Terry M. Moe,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Katrina, Education, and the Second Face of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William G. Howell, Terry M. Moe, *Presidents, Popu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少也应 对 美国 主要 政党 的 内部 管治 结构 做 更新 和 修缮 才行。^①

另外，帕特南等明显没有注意到进步主义在美国政治史上投射的若干其他阴暗面。比如，20 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们并不反对帝国主义的进路，甚至往往支持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或至少在此类问题上保持默认的态度。因此，就算进步主义对于美国内部的发展是较为积极正面的，但进步主义却未必会对别的国家产生任何助益，甚至还可能带来灾祸。^② 又如，美国学界的一般共识是，20 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几乎完全没有削弱那些大财团企业的不断扩张的社会性、政治性和经济性力量。^③ 此外，我们也看到有评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的美国社会并没有一种清晰且强大的基于平等原则和社群主义理路的进步主义上扬势力存在，更不必说工薪阶层的白人与进步主义力量（主要是白人知识分子和各少数民族裔）之间存在一系列难以调和的矛盾。^④

于是，针对这样的一部研究自然可以问，那历史终究是轮回的？还是一去不复返的呢？新进步主义又是否真的可使美国重新振起吗？

① 参见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 *Ian Shapiro: Responsible Par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亦可参见李海默《美国政治极化现象：三个不同维度的观察》，《二十一世纪》2021 年第 2 期。

② 参见 William E. Leuchtenburg, “Progressivism and Imperialism: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898 – 1916”,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39, No. 3, 1952, pp. 483 – 504.

③ Cullis, P., “The Limits of Progressivism: Louis Brandeis, Democracy and the Corpor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30, No. 3, 1996, pp. 381 – 404.

④ 参见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is-another-progressive-era-coming/>.

Abstracts

The Division of Duties between Inspectors and Governors in Qing Dynasty

—Evidence from Their Prospect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Zhong Lingna; Xie Fang

[**Abstract**] There are divided views towards the duty of inspectors and governors in Qing dynasty. One claims that they executed identical works, while the other highlights the divergence of their duty. Using biographic data of inspectors and governors, we studied the impact of both tax revenue and social risks on the prospect of provincial leader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division of duties between inspectors and governors, which implies that social risks were the main concern for inspectors and tax revenue for governor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Inspector and Governors;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adre Stratum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Brief Analysis Based on Driving Variables, Five-dimension
Connotation and Supporting Mechanism

Yuan Chao; Long Xuegang

[**Abstract**] Cadres are key to supporting the running of the Party-government system in China, which has a key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 a holistic organization, cadre stratum is an organic structure composed of five major elements: political standards, age ladder, knowledge composition, ability orientation and behavior style. Theoretically speaking, the real-time state of the cadre stratum structure determines the ability of cadres and its exertion, so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adre stratum should have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flexibility, adaptability, standardization and organicity.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need to be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 the world political competition form, the domestic soci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e reform of cadre personnel system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cadre team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relevant policy, the analysis of the five elements of cadre structure reflect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mainly adjusted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sessment,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to ensure the smooth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adre stratum. According to the perspective theory, the study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adre stratum still has a large space for expansion, and it is worth extending from the mesoscopic research to that on the macro political development form and it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adres; Structure of Cadre Stratum;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 Preliminary Comparison of “Transformative Age” and “Saddle Period”

Lu Hu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ve Age” is a key concept that cannot be bypassed when combing through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r. Chang Hao. With the help of the influential German conceptual historian Reinhart Koselleck and his “saddle period” hypothesis, we can understand better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ormative Age”, and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ncerns behind it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common background of the 20th century revolutions and wars, Chang Hao and Koselleck’s careful consideration for *realpolitik*, and their borrowing from different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sources provide some basis for comparing the “Transformative Age” and the “saddle period” hypothesis. This comparison may help us to better investigat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ve Age” and the “saddle period” hypothesis on the notion of time, humanism, and utopia. Moreover, it makes us to go deeper into Chang Hao’s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insight of his thought world. This approach will be useful for breaking away from the unidirectional and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Subjectivity, an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a more balanced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thought.

[**Key Words**] Chang Hao; Reinhart Koselleck; Transformative Age; Saddle Perio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in-ben (People-oriented) Politics

—Probing into the Five-power Constitutional Scheme with
Division of Powers and Functions as the Pivot

Yang Yukang

[**Abstract**] The Min-ben (民本) thought has a basic rational posi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because it fundamentally reflected the relationship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enefit and harm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public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It included the pursuit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 wisdom of ruling experience,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volution, which ref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public. Sun Yat-sen carried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in the Min-ben thinking, and in his later years used the Five-power constitutional state power structure scheme as the pivot of the Division of Powers and Functions, which reconstructed this tradi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hip. It completely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from monarchy to republic, reformed the unequal legal rights between the political elite and the general public, gave full play to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led by political elites, and achieved the co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Min-ben* politics. Under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public, the Five-power Constitutional Scheme had different relationship of government-popular, state-society and even political elite-social masses from the Western, which emphasized the constitutional spirit of the whole par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olitical elite to serve the country as one. So this scheme actually activated the tradition and made a breakthrough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It was different from modern western constitutional logic of *Checks and Balances Separation of Powers*-the Limited Government-Freedom and Equality, forming the idea of Division of Powers and Functions-the Universal Government-Freedom and Equality (Sun Yat-sen

reinterpretation), which had become a landmark political design sample of modern Sino-Western dialogue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a.

[**Key Words**] Min-ben, Political Elite-social Masses, The Five-power Constitutional Scheme, The Western Constitutionalism, Division of Powers and Functions

Reorienting Politic Science: 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Yao Zhongqiu

[**Abstract**] Western mainstream political science, formed based on its own special historical experience, takes freedom as the basic value and redistribution as the central subject, which is basically not applicable for non-Western countries.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for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to build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hich will take historical politics as the basic approach, equality as the basic value, and development as the central subject.

[**Key Words**] Politic Science; Historic Political Science; Equality; Development

On the Future of Tianxia System

—A Brief Comment on Zhao Tingyang’s Tianxia Theory

Yao Xuanmin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ianxia” in the pre Qin period emerged in contemporary times due to the conditions of “timing”, “geographical advantage”, and “har-

mony between people” .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thought on the current world order means that the “Tianxia” thought in the pre-qin period or Zhao Tingyang’s Tianxia Theory implies some rational limit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Firstly, the realistic prototypes used to construct the Tianxia System are mainly imaginative; Secondly, the Tianxia System is a “Chinese style” world political platform; Once again, the responsibility set by the Tianxia System for oneself is too heavy.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ing the Tianxia Theory, if we cannot realize the actual “position” of China in the current world, and if we cannot constantly remind ourselves of “knowing yourself”, then the Tianxia System is highly likely to lead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a “Tianxia trap” similar to the “collapse of the Zhou Dynasty” .

[**Key Words**] Zhao Tingyang; Tianxia System;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an the Neo-progressivism Save America from It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 Book Review on Robert Putnam et al. ’s *The Upswing*

Li Haimo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cent book *The Upswing*, by Professor Robert D. Putnam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d analyzes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this article, *The Upswing* is measured to some extent against a number of other newly published studies. Overall, *The Upswing*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t fully reveals that the polarization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only b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through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and the import of new ideas,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partial, minor repairs to really work.

[**Key Words**] Robert Putnam, American Politics, The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